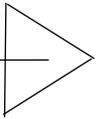


誰是後人類主體：人民、鄉民或世界公民？

口述作者 ■曹家榮 /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文字整理 ■林品君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傳統人文主義的理性主體，將人類的樣貌設想為自主、獨立與理性的主體。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理性帶來的非理性後果，反思理性的批判性和後現代思潮不曾中斷過，但它們容易淪為支持或者棄絕理性的選擇題。後人類思想作為另一種力量，將視角轉向尋找另類的替代選擇，並同時思考人與非人的共同生存層面。人類並非可全能主宰、獨立於客體存在的主體，因為人類與其他物或物種的連結並未斷裂，認知與思維的運作經常需要在與「物」的互動中才得以產生。另外，理性也並不僅是依靠獨立的意識來作用，後人類強調身體的感受性。人類之間的身體殊異是促成非意識層次上感官事物的差異基礎，也是理性樣貌得以展現的多元前提。透過鄉民和世界公民的形象所想像的主體，更能體現後人類所設想的主體樣貌。儘管後人類思想尚未實質改變當今以人為中心建構的政治與經濟議程；但是它作為現實社會的應然面向可以顛覆的視角重新來檢視人的「在世存

有」性。

後人類起源於反思理性主義

從思想史看，傳統人文主義的主體建立在大寫理性的基礎上，它設想的人類樣貌為獨立、自主和理性的主體。二十世紀中葉以降，人們依賴或信任的理性開始出現問題，比如風險社會突顯出一種看似理性、實則非理性的支配模式。於是乎西方學界出現反思人文主義的聲浪，不過該反思常淪於二元劃分的概念。一派立場不放棄理性，比如 Jürgen Habermas；另一派則走向後現代，甚至棄絕理性。1990年代起，後人類學者 Rosi Braidotti 和 Donna Haraway 等人認為上述派別皆使理性走入僵局，她們欲思考另一種理性的可能性。反思另一種理性的可能即是想像另一種人類主體的樣態。例如，Haraway 呼籲「尋求另一種全球化的可能性」，反思當今理性主義式的全球化，並想像人類與其他物或物種的共同生活。

從科技和現實的角度看來，人文主義的

理性主體認為大腦意識最為重要，而身體是上帝有缺陷的設計（身體會老、會死、會生病）。若是我們可將意識打包上傳，理性的創造品即能無限發展下去，人類便成為了最偉大的生物。但在資訊科技中，已經可見人機科技、改良基因、變造動物的重大進展，彰顯了人與非人（技術物、動物）的模糊界線。在社會現實面，核爆、污染的發生動搖了理性的根基。人文主義所想像的理性主體並非一個不能深究和必然穩固的事實了。以上的背景脈絡促使後人類學者反思理性主體的轉化，也讓女性主義者得以反思兩性性別的建構。Katherine Hayles 在《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2017/1999）探索人類的身體而非意識，提出身體的感受性和感官力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基礎所在。她後期更發展出認知是奠基在身體的運作和感官能力上。若無身體的感官認知，人類其實無法理性思考。當我們將身體置換成一具具無差異的機器身體時，形同抹除了主體之間的認知差異，也抹除了差異理性的發展可能，其結果是理性的創造潛力也隨之消失。由此可見，非意識的身體、情感和情緒過程等等足以影響意識的認知運作。

後人類晚近結合新物質主義

晚近幾年，後人類的發展多被放入新物質主義中討論。新物質主義關注物質的層面，

與後人類思想強調人與非人的共生分享親近性。諸多後人類學者的用詞皆可體現人與非人的共存狀態，比如 Haraway 以「共同生存」、Braidotti 以「人的主體狀態與其他非人物質混雜在一起」、Jane Bennett 以「能動存有論（*agential ontology*）（人的存在是透過與其他東西／環境的互動過程才得以彰顯和形成。）」等用詞提倡非人（它物或物種）的重要性。人的行動背後一定伴隨著與技術或環境的關係。

新物質主義是很多元的新思潮，相關的討論取向包含人類世、女性主義和神經科學哲學等等。Bruno Latour 的討論反省人類世，披露出人和非人的物種關係；Haraway 類似於 Latour，但更側重女性主義的關懷；Hayles 則提出非意識，參照了腦神經科學，強調人類行動中的非人性、非意識過程。一般認為意識與無意識是影響我們思考的唯一因素，但其實在意識與無意識層面之下，另有神經感官的非意識層次運作搶先一步在左右著我們的思考。比如，我們看到某些東西會有無以名狀的感官情緒（神經官能運作、大腦神經元傳輸、內分泌作用的促發感覺），而這些非意識層次的運作已經影響了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看法。另一位腦神經科學家，Antonio Damasio 提出「原我」的概念。不同於心理學的自我僅停留在意識層次，他認為若深挖意識會找到原我，即原初的自我。原我來自人類的感官能力，人

們得以感覺自身的存在與外在不同。它無以名狀，但卻是意識的形成基礎。Damasio 認為人類之所以會形成自我意識或自我概念，除了來自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建構，也來自於身體感官的基礎差異。人與人之間感受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具有無數的細緻差異，這些正是我們的個性、人格、自我意識的形成原因。因此，對於 Hayles 和 Damasio 來說，非意識是腦袋運作的重要基礎。這些思想讓人們從理性主體強調意識是人類的存在基礎，走向多層次和複雜化的主體面向。

後人類與理性的主體差異性

哲學上討論何以為人時，不再僅是依據有無生物式生命作為判准，更多的是涉及如何認識、行動和生存。因此，人文主義以降的大寫理性主體和後人類設想的主體差異可以從認識論、倫理學和存有論三方面來作區分。在認識論層次上，René Descartes 的理性主體最典型是在說明主客對立。人是主體，可以主動掌握和認知客體，而對象物是被認識客體，沒有行動能力和被動存在。在這個前提下，人與環境的關係是斷裂的。相對而言，後人類則主張人們並非獨立於環境地認識萬物，關係的連結並未被切斷。以 Hayles 的思想說明，人的理性思考需要與外在環境合作才有可能。例如，近視者需要仰賴眼鏡才能清楚觀看，而在此時作觀看的是眼鏡還是人類主體

已然模糊不清。同理也可推論至書寫、騎車等技術情境。現代人已經脫離不了與科技物件的合作才能夠思考和行動。人類一直都是技術的動物，理性從來不是純粹腦袋的運作產物，因為與外在的互動從來不是獨立的。

以倫理學層次看，人從來不是主宰和唯一的行動者，而不過是諸多行動者之一。Descartes 的理性主體將其他對象視為無生命的被動客體，唯有人才具備生命和行動的主宰和決策能力。這導致了人類中心的思想而衍伸出理性專制的現實。後人類將人降至與非人更為接近和平等的狀態。人類並非唯一可以做決策的主宰者，老實說人們做出的決策常常是錯的。人類其實常常不能做決策，比如欲探知核能裝置，人類仍須透過技術物的幫助。尤其當儀表板、偵測器等技術物的效果背叛人類的期待時，就可發現人類理性的貢獻極為有限。Bennett 認為人的行動如同丟進池塘裡的小石頭，小石頭本身引發的漣漪並非隨著波的擴張在直線前進，反而該石頭僅是眾多石頭之一，而原先的漣漪因為與池塘中其他物質（環境、其他技術物）的互動而扭曲變化，進而才走向未知的地方。現象是組裝（Assemblage）過程的產物，呈現出來的結果是各種力量的組裝產物。這些概念皆試圖說明人並非唯一的行動者。

從存有論層次說，理性的主體是從認識

論和倫理學推導出來的，這意謂只有在獨立認識世界、自主行動倫理的雙重前提之下，人類才作為主體而存在。後人類則認為人是在行動當中和其他的事物及其環境發生了關係之後才凸顯「我存在」的差別意識。Martin Heidegger 儘管仍屬於人類主體的哲學家，在他所謂人是「在世存有」的概念中，也以提醒著人是在世間與其他事物發生關係，人的存在才會迸生。與此同理，後人類主體不再強調人的「獨立性」，我們是在其他事物的共在關係當中才會存在。

後人類作為政治、社會應然面

當今世界仍然處在人類中心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後人類的思想自然不會被排入討論的議程，有意義的改變也無法在未來幾十年內發生。儘管人類世的討論，一種以地球為整體再思考政治、經濟乃至於環境的安排已紛紛出現，而 Latour 鼓吹人與非人行動者的社會思想也開始被學術社群所重視，但是這些討論多數只能被稱作「理想」。不過，後人類思想看似「理想」，卻是人類勢必反思的「應然」。比如，我們應對 COVID-19 的方式仍舊是以人為中心的角度來「管制」或「處理」病毒擴散的問題，導致結果是太多東西並未被考量到。疫情涉及到人和非人的因素，這正是人類世處理的尺度。當我們把人類與非人的行動考量進來後，才可更清醒地意識到人能

做的其實很少。唯有認識人類的理性限制，才能夠試著跳脫人類中心去思考出一個更適切的策略。

後人類思想與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理性互相衝突而難以被納入討論議程。若以 Haraway 的用詞，後人類思維是「減法思維」，亦即「不做」。也就是說，從這一角度來思考，COVID-19 的最佳應對方式是不要再做什麼了。理性主義的思維則是「去做」，「無為」被視為放棄努力，有違人類的先進和進步。但事實上，當我們不斷要去解決什麼問題，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我們不能移動卻不斷想著如何移動：當疫情開始趨緩、疫苗開始出現，我們又不斷想要做些什麼，但是不能夠不做什麼嗎？人類歷史就是不斷在重複行動、引發危機、設法解決的問題循環。二十世紀歷經的兩次世界大戰，武器和軍事的重要性被放大，納粹德國極致化理性的管理、卻執行不人道的屠殺。1970 至 1990 年代的資訊、基因、核子等科學技術蓬勃地發展。1980 至 1990 年代前後，「人類可以控制、決定和主宰一切」的姿態被用來發展政治及經濟，結果導致許多問題的出現，比如經濟危機、車諾比核爆。以上的現實問題皆出在我們太過想要「去做」，因為理性主體認為，人不行動意味著放棄自主決策的能力，也喪失了作為人的獨特性。但是後人類主體認清，人類力量的有限性迫使我們反思何以

為人的根本問題。

後人類的人民、鄉民、世界公民

對照民族國家，人民是指被國家統治的一群人。參照網路科技，鄉民為一種參與樣態的新公民。處在全球社會，世界公民指向在世存在的一體歸屬感。人民是以傳統人類主體的角度來定義，與後人類的關係最弱。鄉民凸顯出非傳統理性主體的形式，有潛力發展後人類的公民樣態。它放大了理性、也擴展了情緒，同時帶來負面（如網路霸凌、公審）及正面（如人們關注台灣的 318 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和緬甸的社會革命）的影響。社群媒體傳播下的文字、照片和語音所召喚出來的並非理性，而是悲憤和義憤。這些都是非理性的範疇，鄉民使我們看見公民的新興形式。再進一步說，世界公民就更加屬於人類世的範疇了。我們大膽想像「世界整體」甚至是「地球整體」可以作為生活和行動單位，在其中每個人皆為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共存的全球風險社會儘管是一種否定性和威脅性的共同體，有其負向的一面（害怕和恐懼不一定激發人們的集體行動），卻也隱含正向（人們與非人可能如何共同生存）的推動力。

後人類作為電影與動漫題材

後人類較早期、最典型的電影是《銀翼殺手》，主角設定為仿生人，故事在探討人的本

質為何？它將人的本質著重在共情性（感受他人的情緒），判斷是人與否的依據為同情心的有無。《奧圖瑪塔》的主角類似機器人，但這是個有自我的機器人。它開始修理自己之時，不正是意識到了它的自我？《人造意識》探討人與非人的界線，人以為自己不可能愛上機器人，但反而愛上了機器人。而在這個情境下，人與機器人的界線何在？《成人世界》欲表達人需要在身體和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才能慢慢長成為自己的樣子。機器人誕生之初如同嬰兒，社會規則、語言和相處模式仍然需要與他人互動才得以習得。動漫《攻殼機動隊》探問人的腦袋裝到機器人身體時是否仍可稱為人？以動畫主角草薙素子的台詞為例，「當我的四隻都是機器，我如何證成我是人」？我們相信，將大腦意識上傳後仍然是人，但經驗現象上真的是如此嗎？到底什麼才構成人？是大腦意識、還是身體非意識、還是環境互動，或者更有其它？以上種種的動漫題材皆在反思理性主體的非必然性，主體的想像不再侷限於理性與意識了。當這些作品在探問機器人與人自身的關係時，通常會藉助身體與意識的界線模糊化，反覆探問成為人類的存在本質。後人類思想不再將主體的想像侷限於理性意識，更多看見人的身體感官與其它萬物的互動過程，可能在形塑出另一種主體樣貌。



作者簡介

曹家榮助理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博士，目前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曹助理教授的研究專長為資訊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社會變遷、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方法，其相關的著作可見於《資訊社會研究》、《文化研究月報》、《新聞學研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等諸多專業學術期刊。